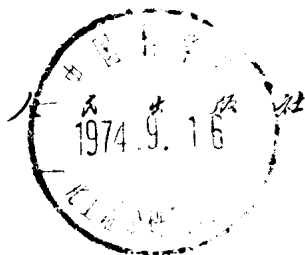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等著

马 集 译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售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73 年 3 月 第 1 版

1973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1001 · 228 每 册 0.50 元

出版者说明

本书选编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时代人写的关于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几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战友，或是马克思的亲属，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两位伟大导师的革命的一生，他们的思想和事业，作了概括而生动的叙述，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

本书译文采用 1962 年本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历史事件、人物、报刊，作了一些注释，附在正文的下面。

1973 年 2 月

2K595/24

目 录

忆马克思	保尔·拉法格 (1)
忆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22)
忆马克思	威廉·李卜克内西 (32)
忆恩格斯	威廉·李卜克内西 (88)
一八四八年前后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103)
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 回忆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124)
关于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35)
动荡的生活简记	燕妮·马克思 (14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59)

忆 马 克 思

保尔·拉法格^①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

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

我第一次看见卡尔·马克思是在 1865 年 2 月。第一国际已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大厅的大会上成立。1865 年 2 月我从巴黎来伦敦，要把这刚成立不久的组织在那儿所获得的成就告诉马克思。托伦先生（ he 现在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个参议员）曾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我那时二十四岁。我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会见所给我的印象。马克思那时常常生病，正在下苦功写作《资本论》第一卷（这书两年后——1867 年出版）。他担心他也许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因此很喜欢接见青年人，时常说：“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

^①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法国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地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写有许多著作。

卡尔·马克思是那些罕见的天才之一，他们不论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马克思把这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们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

马克思认为，不论从事那一种科学研究，都不应该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而烦心；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象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马克思曾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说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他确信，每一个不为资产阶级利益影响、不为阶级偏见所蒙蔽的公正人士，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虽然并不抱任何成见，但他从事著作却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传播他研究的结果，同时具有坚定的决心，要给一直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要促成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这一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当它一取得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导权，就要去建立共产主义。

马克思并不把他的活动局限于他所生长的国度，他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在法、比、英这些国度里（事变和政治迫害把他赶到那里），他

都出色地参加了在那里展开的革命运动。

可是，当我第一次在梅特兰公园路他的书斋里见到他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的并不是一位不屈不挠和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鼓动家，而是一个学者。党的同志们为了就各种问题求教于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师，从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成群地拥向这里。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马克思精神生活的深处，就必须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

这房间在二层楼上，有一扇可以俯瞰公园的宽大的窗户，光线很充足。在壁炉的两边和窗子的对过，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壁炉的对面，在窗子的一边有两张桌子，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呎长两呎宽），还有一把木头的安乐椅。在这椅子和对着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间放有一张皮面的沙发，马克思有时躺在这上面休息。壁炉上也放着书，还放有雪茄烟、火柴盒、烟盒、吸墨纸以及他的女儿们、他的夫人、沃尔弗^①和恩格斯的照片。

马克思吸烟吸得很厉害。

“《资本论》甚至将不够偿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钱。”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

但他火柴用得更多，他常常忘记了他的烟斗或雪茄，不得不老去点它，因而在短得令人难以相信的时间内就用完了一盒火柴。

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

^① 威廉·沃尔弗(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

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令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象他自己的四肢一样地服从他的意志。

他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各种开本的书和小册子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不是按书本的大小而是按内容来安排书籍的。书对于他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他不重视它们的样式、装订以及纸张和印刷的美观；他常折叠书角，画线，用铅笔在页边空白上作满记号。他不在书里写批注，但当他发现作者有错误的时候，他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个问号或一个惊叹号。画横线的方法使他能够非常容易地在书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他有这么一种习惯，隔一些时候就要重读一次他的笔记和书中做上了记号的地方，来巩固他的非常强而且精确的记忆。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听从黑格尔的劝告，用一种不熟悉的外国语去背诵诗歌，借以锻炼他的记忆力。

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并且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他经常研读诗人们的著作，从整个欧洲文学中挑选诗人；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①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

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1848年以后，当马克思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善的境地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已经很高了），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并加以分类。对于科贝特^①（这位作者也是他很敬重的）的论辩著作他也下了同样的功夫。但丁^②与白恩士也是他所喜爱的诗人。听自己的女儿们背诵苏格兰诗人白恩士的讽刺诗或咏唱诗人的情歌，对于他是一件莫大的乐事。

不知疲劳的工作者和伟大的学者居维叶担任巴黎博物馆馆长的时候，在馆内为自己设立了几个专门的工作室。规定一个工作室供一种特殊的研究工作用，其中备有这种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书籍、仪器、解剖用品等等。当他作某一种研究疲倦了的时候，他就到另外一个工作室，作另一种工作，这就是他的休息。

马克思也同样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但他没有钱象居维叶那样为自己设备几个工作室。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象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

有时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象达尔文一样，他也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他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小说。现代小说家中，他最喜欢保尔·德·科克、查理·利弗尔、亚历山大·大仲马和瓦尔特·司各脱，他认为司各脱的长篇小说《清教徒》是一部典范作品。他特别喜欢探险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说。

①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的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

② 但丁（1265—1321），中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

他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家。他把《唐·吉珂德》当作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骑士的德性在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已显得荒诞和可笑了。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一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重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利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马克思能够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使精通这几种文字的人都称赞不已。他喜欢这样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他有惊人的语言天才，他的女儿们也继承了这种天才。当他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尽管俄文十分困难，但经过半年的学习，他已经能够津津有味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别敬爱普希金、果戈里和谢德林。他学俄文是为了能够阅读几种官方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由于揭露了骇人听闻的材料而被政府禁止发表。马克思的几个忠诚的朋友设法为他弄到了这些文件。无疑地，他是西欧唯一了解这些文件的经济学家。

除了读诗歌和小说以外，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演算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安慰，在他那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在他的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能再继续照常从事科学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些微的安宁。在这个精神痛苦的期间，他写了

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据看过这篇论文的专家们说，这篇论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高等数学中，他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他又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他毕生研究工作中所长期辛勤搜集到的一千多本书，但这些书还不够他用。许多年来，他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常客，他十分看重这儿的书库。

即令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不仅就他专长政治经济学而言，就是对于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也是如此。

虽然他睡得很晚，但他总是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起床。喝完一杯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之后，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只是在吃饭和傍晚（当天气好的时候）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才休息一会，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马克思在年轻时就习惯通宵工作。

工作变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是如此地专心工作，以致废寝忘食。他常常要被呼唤好几遍才下楼到餐室去，而且几乎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回他的书房去了。

他吃得很少，甚至因胃口不佳而感到痛苦。为了增强食欲，他尽量吃些调味很浓的带刺激性的食物，如火腿、熏鱼、鱼子酱和泡菜等。他的胃囊不能不为他那头脑的繁重工作付出代价。

真的，由于思考是他无上的乐事，他的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我常听到他引用他青年时代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一句话：“即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

马克思要有很强健的身体，才能支持那样非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费精力的脑力劳动。而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强健有力的。他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宽、胸厚、四肢很匀称，只是躯干与两腿比较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情况。如果他在年轻时多作体操的话，他会成为非常强壮的人。他经常做的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能够一连走几个钟头，甚至攀登小山，还不断谈话和吸烟，一点不感觉疲倦。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在书房里散步时就是在工作。他只在书桌前稍坐一会儿，把他漫步时所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他非常喜欢踱来踱去地和人谈话，只有当谈话谈得非常活跃或特别重要的时候，他才时而停下来。

许多年来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晚间散步，就是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经济学的知识，也许他自己也不觉得就把《资本论》第一章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

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我刚才所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最初我追随马克思那深湛浩繁的思想进程非常困难。可惜我把这些珍贵的札记都丢掉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抢去烧毁了。

我特别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笔记也失去了。在这天晚上，马克思以只有他所特有的那种丰富的旁征博引和见解向我讲解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辉煌理论。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的共同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尽我微末的能力向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们^①讲解的时候，这理论对他们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是马克思理论中最伟大的理论，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人类智慧所曾经思考出来的最伟大的理论。

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而且他又是非常善于利用他长期脑力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观察的。无论何时，无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向马克思提出来，都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最详尽的回答，而且总是包含有概括性的哲学见解。他的头脑就象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毫无疑问，《资本论》向我们展示了一颗最有魄力和学识丰富的心灵。但在我看来，也象一切熟知马克思的人看来一样，无论《资本论》或是他的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把他的天才和学识的伟大完全表现出来。他矗然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我与马克思一块儿工作过。我只不过是记录他口述的书记而已，但这给了我一个观察他怎样思索和怎样写作的机会。对于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时又是困难的。其所以容易，因为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的事实和见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脑海；但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事实和见解，使得完满表现他的思想成为困难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

马克思理解事物的本质。他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组成部分。他分出每一个组成部分并探寻它发展的历史。

^① 巴黎公社失败后，拉法格从巴黎流亡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受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领导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然后他就由事物转而考察它的环境，观察后者对前者 and 前者对后者的相互作用。接着又回头去探讨所研究的事物的起源、变化、进化以及它所完成的革命，最后甚至探究它各种各样的作用。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个别的离开环境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不断运动的世界。

马克思是想在这个世界如此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去阐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福楼拜和贡古尔派的小说家们常抱怨精确地描写我们所见的事物有多么困难，可是他们所想描写的，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是他们所得到的印象而已。他们的文学工作和马克思所担负的工作比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就需要非凡的思考力，而要把他所看到与他想说的东西传给别人，也需要同样的非凡的艺术。

他从来不满意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兼有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须具有两种品质。他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细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内在的联系。他的论证方法，不是抽象的，如有些不能思索的经济学家所非难他的那样。他的方法不是几何学家的方法，几何学家在从周围世界抽出自己的定义之后，就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结论。我们在《资本论》中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定义或公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对现实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最细微的差异和最小的区别都表达出来了。

马克思从确定下述这个显著的事实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乃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因

此商品(它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数学上的抽象)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细胞。马克思紧紧抓住了商品这东西,从各方面来观察,甚至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把其中的秘密一个一个地揭开来。这些秘密是御用经济学者根本猜想不到的,但这些秘密却比天主教的神秘更加繁多、更加深奥。从各方面研究了商品之后,他就进而考察在交换中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然后转而研究商品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条件。他在考察商品存在的各种形态时,表明商品怎样从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一种形态又怎样必然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现象发展的逻辑过程表现得那样巧妙和完善,以致人们以为这是马克思自己臆想出来的;但它却是从现实中抽出来的,而且是商品的真正辩证法的再现。

马克思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权威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一个人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责任。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去做非常繁多的事情，这些繁重的工作，读者恐怕是很难想象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那些铅笔记号表示他曾从头至尾地通读了这些书。他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如此敬重作这些报告的人，以致怀疑在别的国度里是否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这样有学识、无偏见而又毫无顾虑的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给他们这样光辉的赞词。

马克思从这些蓝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上院和下院的许多议员们（他们都发到一份）只是把这些蓝皮书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数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的武器的威力。另外有些议员把它们当作废纸按重量出卖，这是他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马克思能够从一个他常去翻阅书籍和旧资料的旧书商那里贱价买到它们。比斯利^①教授

^① 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31—1915），英国的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曾积极参与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运动。